

· 敦煌百年 ·

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 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

朱大星

《文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即已著录,置于道家类,云:“《文子》九篇。”班固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然检今本^①《文子》,“周平王问”只存“平王问”三字,皆无“周”字。自《汉书·艺文志》之后,众多朝代史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中都有关于《文子》的记载。如《隋书·经籍志》载有《文子》十二卷,其注云:“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录》十卷,亡。”《旧唐书·经籍志》云:“《文子》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有“《文子》十二卷,徐灵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训注《文子》十二卷”的记载。又《宋史·艺文志》云:“李暹训注《文子》十二卷,朱弁《文子》注十二卷。”《清史稿·艺文志》也有关于《文子》的记载。由此可见,《文子》一书自汉迄今都有流传,源流分明。

《文子》不仅历代史书有记载,而且它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子》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中的著录位置仅次于《老子》,列于《列子》、《蜎子》(据班固自注,蜎子也是老子弟子)、《关尹子》之前,《隋书·经籍志》中《文子》在道家类中的著录位置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文子》在道家的地位是很

高的。在汉代，《文子》看来是为学术界所重视的，不仅刘向等编写的《淮南子》引用了《文子》中的大量字句，而且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云：“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书称平王问道，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黯取之。‘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魏相取之。‘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董仲舒取之。”王应麟这样说是事实作根据的。如《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云：“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义兵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即出于《文子·道德》，是其证。另外，枚乘、班固、郑昌、陆抗及曹植^②均曾引用过《文子》有关字句。在唐代，《文子》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李善^③、杜甫、韩愈、孙思邈都曾引用过《文子》的有关字句（以上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在道教盛行的唐玄宗时代，《文子》与《庄子》、《列子》等同被尊为经^④，由此可见《文子》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清代孙星衍亦云：“黄帝之言述于老聃，老聃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⑤从众人对《文子》的征引或推崇中，我们可以想见它的影响之大。然而在一些与诸子有关的书中，如《诸子集成》^⑥、《百子全书》^⑦，皆未收录《文子》，这与《文子》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虽然，许多书籍都有关于《文子》的记载且其书内容屡被世人征引，但因《文子》成书较早，历两千余年至今，宋以前传本已极罕见，故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写本《文子》残卷尤显珍贵。《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收录与《文子》有关

者凡六种，计有 S. 2506、P. 2380、P. 2456、P. 2810、P. 3768、P. 4073，详述如下：

P. 2380 《宝藏》题名《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此卷正面凡六行，载有抄写年月“大唐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一日”、抄写缘由“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及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姓名。此卷抄写年代甚明，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卷中无《文子》内容，而黄永武先生定其名为《文子题记》^⑧。又谭蝉雪先生在其《敦煌道经题记综述》^⑨一文中也据 P. 2380 指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在史书记载（742 年）的三年前已行之，并认为据此可补史书之阙，未知何据？二是 P. 2380 抄写年月为“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已出现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与史书的记载不一致。《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即二月七日），唐玄宗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另外《旧唐书·礼仪志四》、《新唐书·玄宗本纪》、《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也有相同的记载。笔者认为，此卷的抄写年代是不大可能会错的。因为人们抄写道经和佛经多是为了祈福还愿或超度亡灵的，故其态度应是极其虔诚恭敬的，不至于连抄写时间都写错。况且此卷表明是皇帝为宗庙及苍生所写的，因此态度应该是更加神圣虔诚的，并且抄写的经卷经过三道校勘的手续，所以抄写时间更不会出错。另外，P. 2380 的抄写者比《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书的作者更接近唐玄宗的时代，因此抄写者的记载也就更加可信。据此，我们认为：唐玄宗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应是在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之前。否则，就不可能在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现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因为人们不可能对以后的事情洞若神明。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旧唐书》等史书关于“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唐玄宗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的记载很可能是错误的。

P. 2456 《宝藏》题名《大道通玄要卷第一并序》、《升玄内

教经卷第八》、《老子道经卷上》、《文子道元第一》、《妙真经卷上》、《灵宝自然经诀》、《上清太极宝签上说卷》、《庄子外篇知北游第廿二》、《老子德经卷下》、《上清经三天正法卷》、《灵宝洞玄法轮经卷》、《神仙钩注经》、《妙真经卷上》、《文子九守第三》、《升玄内教经卷第三》、《上清化胎精中经卷》、《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卷》、《文子微明第七》，上述内容应当总定名为《道经杂抄》。而《文子》内容散见于其中，计有三处。其中《文子·道元第一》，凡六行，起“老子曰道者虚无平易”，迄于“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卷面较清晰。《文子·九守第三》，凡八行，起“老子曰天地未形”，迄于“冲气以为和”，首行第一字较模糊。《文子·微明第七》，凡十行，起“中黄子曰天有五方”，迄于“万物玄同无非无是”，末行“无是”二字脱落。以上三处《文子》内容虽未集中在一起，但其笔迹、行款皆一致，卷中“世”字照录。在上述道经中，《大道通玄要》的成书时间为最晚，约在唐玄宗开元七年^⑩，因此本卷的抄写年代可能是在唐玄宗以后。

P. 3768 《宝藏》题名《文子·道德第五》，此卷卷面较清晰，凡百五十六行，每行五至二十三字不等，绝大多数为二十字左右，起“道不战而克”，迄于“平王曰寡人闻命”。首行自第八字至行末共九字残损，卷末载有校定日期“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文子道德第五”字样及校者姓名。此卷篇幅与今本《文子·道德第五》相当，卷中“民”“世”“治”三字皆不讳。既然此卷标明校定日期为“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为何“世”“民”“治”三字又不讳，这是否互相矛盾呢？我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册府元龟》卷三《帝王部·名讳》云：“武德九年，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令曰：‘依礼，二名义不遍讳。……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又云：“（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壬寅，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

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成，不须随义改易。”据此，“世”“民”“治”可以不讳。另外先秦以来也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说法。唐天宝十载时，《文子》已被尊为经，按照“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原则，“世”“民”“治”也是可以不讳的。又《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天宝元年）二月丁亥，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旧唐书·礼仪志四》、《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帝王部》也有类似的记载。因而，按理此卷应题名《通玄真经》才是，却仍定名为《文子》。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道学博士是在天宝元年设置的。可在天宝二年又改道学博士为学士（参《旧唐书·礼仪志四》、《新唐书·百官志三》）。此时为天宝十载，却依然沿用“道学博士”的称号。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呢？一种情况可能是抄手依葫芦画瓢，未及深思所致。但是抄手据卷中表明是道学博士，按理在道学盛行的开元、天宝年间，其对道家的重要经典《文子》应是耳熟能详并备加推崇的，不至于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再者，天宝十载时，虽然《文子》改为《通玄真经》、“道学博士”改为“学士”了，可抄写者遵照习惯而沿用旧称“《文子》”及“道学博士”，也未可知。

P. 2810（甲）+S. 2506（甲）+P. 4073+P. 2810（乙）^⑩

P. 2810 《宝藏》题名《文子下德篇残卷》。P. 2810 包含 P. 2810（甲）、P. 2810（乙）两个残卷。P. 2810（甲）正面，凡八行，行十七字，起“人地之生财大本不过五行”，迄于“德有心则险”，自第二行处分段，末行前十三字缺损，“治”字照录。卷背面载有天宝十四载至上元元年事，言及安史之乱，玄宗幸蜀，改元至德、乾元、上元等事。P. 2810（乙）正面，凡八行，行十七字，起“时君者用六律”，迄于“秋收冬藏取与”，首行第二字至

第六字、第十一字、第十五字，末行行首四字及行末两字皆残损。卷中“世”字缺笔避讳，而“治”照录。卷背面载有唐上元元年至大历五年事。从字体及行款看，P. 2810（甲）、P. 2810（乙）当系同一人抄写而成，且原属同一卷，后来才被析为两个残卷。但这两个残卷并不相连，它们中间约脱去十四行，脱去的这部分内容就是S. 2506（甲）（指S. 2506前七行内容：起“心有目则眩”，迄于“因物以识”）及P. 4073所载内容。又P. 2810（甲）后当紧接S. 2506（甲）及P. 4073，而P. 2810（乙）紧接P. 4073“霸者则四”处。

S. 2506 《宝藏》题名《文子》，全卷正面凡十四行，行十七字，字体秀美，分别于第三行、第八行、第十二行处分段，第十三行第七字模糊，文中“世”“民”二字缺笔避讳。S. 2506包括S. 2506（甲）和S. 2506（乙）两部分。S. 2506（甲）正面：凡七行，起“心有目则眩”，迄于“因物以识”。卷背面载有开元十四年至开元二十四年事。S. 2506（乙）：指S. 2506后七行内容，起“足者因其所有”，迄于“可得而量也明可”。卷背面载有开元二十五年至天宝十三载事。必须指出的是：黄永武先生将S. 2506（乙）与S. 2506（甲）连缀成文，是错误的，当据正。实际上，S. 2506（乙）与S. 2506（甲）并不相连。S. 2506（乙）当居P. 2810（甲）之前，但并不相连，它们中间约脱去二十四行。

P. 4073 宝藏题名《文子》。此卷前面紧接S. 2506（甲）第七行“因物以识”，后接P. 2810（乙）“时君者用六律”，正面凡八行，行十七字，起“物因人以知人也”，迄于“霸者则四”。卷面较模糊，首行残损严重，第五行第三字第四字脱落。背面载有唐德宗大事记。

星按：S. 2506（乙）、P. 2810（甲）、S. 2506（甲）、P. 4073、P. 2810（乙）五个卷子字体都相同；其内容皆属于《文子·下德》；行款也一致：即除分段处外，每行皆为十七字；均只讳

“世”“民”二字，而不讳“治”字；且后四个卷子前后衔接自然。除此之外，上述五个卷子背面文字字迹皆相同，且所记事迹年代基本相连。由此可知，上述五个卷子显系同一人抄写的，并属同一卷撕裂而成。它们应当都是唐写本，其抄写年代上限止于唐太宗时。

上面叙述了敦煌本《文子》残卷的基本情况及其抄写的大致时期。下面我们再谈谈它的价值。

首先，根据这些残卷可校正今本《文子》中的许多异文。如“法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文子·下德》），今本作“法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德与天地参光，明与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星按：今本误。“参”、“并”、“总”义近，皆有合或并列义。“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即《文子·精诚》“故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之意，文义顺适。《淮南子·本经》同敦煌本，亦可为证。若依今本，则文义不畅，又失其俪偶，盖浅人不明句义而妄增字以求解也。又如“动静调受阴阳，喜怒和受四时”（《文子·下德》），今本“喜”皆作“嗔”。星按：今本非。前句“动”“静”为反义，则此当以作“喜怒”为是。“喜”“怒”常反义连言。《文子·九守》：“夫哀乐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过。”《文子·道原》：“夫喜怒者，道之衰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又《文子·下德》：“理好憎即忧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皆其例。另从句意看，亦当以“喜怒”为是。《淮南子·本经》作“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文稍异，义并同。若作“嗔”，则“嗔怒和受四时”与“动静调受阴阳”义不谐，且失其俪偶。类似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透过敦煌本《文子》残卷也可以窥见《文子》一书的版本源流。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包括《文子》。持西汉竹简本《文子》与今本《文

子》比勘，结果发现简文中的多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窜改的痕迹非常明显。因此，学者认为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改过^②。那么《文子》是何时经人窜改的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汉书·艺文志》载《文子》为九篇，则可知班固时所见之《文子》是以“篇”为目次的。而《隋书·经籍志》有“《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录》十卷，亡”的记载，由此可知西汉刘歆所见之《文子》也是以“篇”来标目，亦为九篇。而到了南朝梁时似乎已用“卷”代替了原来的“篇”，并且“篇”与“卷”的数目也不同，《文子》由九篇变成了十卷，大概在南朝梁时《文子》一书开始有所变化了。而到了唐代，《文子》变化似乎更大了，并且变得更接近今本《文子》的模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发现的敦煌本《文子》残卷中句首多冠有“老子曰”三字，如“老子曰：‘执一世之法，藉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而调瑟也’”（见 P. 3768）、“老子曰：‘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见 P. 2810）、“老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见 P. 4073）。但是《文子》本来是没有“老子曰”字样的^③，敦煌本《文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句首多冠有“老子曰”的最早版本，而今本《文子》也多冠有“老子曰”三字，且“老子曰”在二本中的位置相同。二是敦煌本《文子》既不以篇标目，也不以卷标目，而是冠以“文子道元第一”、“文子九守第三”、“文子道德第五”“文子下德第九”等，这与唐前后的《文子》版本都有所不同。如今本《文子》为十二卷，每卷一篇，十二卷共计十二篇。持敦煌本《文子》与今本《文子》对校，发现“文子道元第一”即今本《文子》卷一《道原篇》，“文子九守第三”即今本《文子》卷三《九守篇》，其余类推，且两者句式和文字大体相同。又《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举》云：“其年（天宝元年）五月，宰臣奏：‘两京及诸郡崇玄学生，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

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请条补，崇玄学生亦合习读。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臣近令诸观寺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通玄》《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玄学生望且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条考试。其《洞灵真经》等，请待业成后准试。’从之。”^④由此可知，在唐玄宗天宝元年之前，《文子》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定本。大概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或稍晚，整理出了比较完善的《文子》定本，让广大道徒习诵；为了表示对李氏先祖老子（老子在唐代被尊为李氏的先祖）的尊崇，因而在定本《文子》中加进了许多“老子曰”。从上述情况看来，唐代可能是《文子》一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且那个大约在唐代整理出来的《文子》定本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十二卷本《文子》的雏形。

再次，从敦煌藏经洞所留下的道教文献中，其中包括《文子》，也可窥见道教在唐时敦煌地区的流行情况。有唐一代，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道教非常盛行。许多重要的道家典籍被封为经，令诸生学习。《旧唐书·礼仪志四》云：“天宝元年二月丙申，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又云：“开元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

道举。”从上述史书的记载中，可知唐玄宗时对《老子》、《文子》等书是非常推崇的。当时对这几部道教经典的推崇大致是依《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的顺序，这在敦煌所发现的文献中也有所体现。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所见敦煌文献有关《老子》者凡四十三个卷号，有关《庄子》者凡十六个卷号，有关《文子》者凡六个卷号，有关《列子》者凡三个卷号（主要依据黄永武《敦煌宝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道教经典在唐朝敦煌地区的流行情况及受重视的程度。

注：

①指道藏本《通玄真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守山阁本校刊本）、《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据铁华馆丛书版影印本）。下同。

②曹植《求通亲亲表》云：“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见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522，下同）即出自《文子·九守》。

③《文选》卷40任昉《奏弹曹景宗》李善注引“《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见梁·萧统《文选》）即出自《文子·微明》。

④后晋·刘昫《旧唐书·玄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215。

⑤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文子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88。

⑥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缩印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

⑧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2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页88—89。

⑨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页8—24。

（下转第287页）

举了西夏姓氏六十七种，其中一字姓十一种，二字姓四十五种，三字姓一种，四字姓一种，党项姓八种，元代西夏姓氏一种。这些都为清代张澍编《西夏姓氏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四，《西夏书》采用“论曰”的形式发表编写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考证史实，或臧否人物，或纵论史事，均能直抒胸臆，观点鲜明。“论曰”内容丰富，涉及西夏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外交等各个领域，一方面反映史书编写者学识渊博，亦可以补史传所未备。

注：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1《周春传》，中华书局，1976年7月。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9《经籍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211页）

⑩参日本·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日本：福武书店，1978年，页344。

⑪为方便叙述，笔者将P2810分为P2810（甲）与P2810（乙），将S2506分为S2506（甲）与S2506（乙）两部分，各部分所指具体内容见行文。

⑫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第8期（总303期），1981年，页12。

⑬参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晓传书斋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74。

⑭引文中“玄”原避康熙讳，皆作“元”，今改回。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